

胡文仲

英语教育
自选集

胡文仲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

Hu Wenzho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胡文仲

英语教育
自选集

胡文仲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

Hu Wenzho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 = Hu Wenzho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胡文仲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8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7-5600-5847-7

I. 胡… II. 胡…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670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丛书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封面设计: 袁璐

封面题字: 赵发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5847-7

定 价: 3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从教五十年以来有关英语教育与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的精选，凝聚了他多年的治学心得，体现了他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热爱，以及为推动英语教学与科研所做的不懈努力。

本丛书收录了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其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寻得。自选集展示了作者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是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资料。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10集，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的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稿，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录。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

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称）和期号（或出版社名称）。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演讲稿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划 刘相东

序

胡文仲教授作为外语界知名专家和学者，在外语教育改革、外语教学、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等方面造诣很深，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多有建树。这部集子主要收录了他论述外语学习、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数十篇文章，凝聚了他多年来的治学心得，充满了真知灼见，相信对于广大外语学习者、教师、研究者等都有很大教益。

该文集主要包括三部分：英语学习篇、外语教育与教学篇、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篇。在“学习篇”里，作者从自身治学经验出发，结合相关理论就语法、听说、阅读、语言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观点。在“外语教育与教学篇”里，作者一方面就宏观的外语教育规划、教育改革、语言规划、教学科研等阐明了自己的论点，另一方面就具体的英语教学大纲制定、交际教学、教学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篇”中，作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文化差异、文化与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文学与文化等专题，并对跨文化研究的趋势、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文集内容丰富，行文流畅，富含深刻的哲理，充满睿智的思想，对广大外语学习者和教研人员了解相关学习方法、文化知识和教育教学理论，吸纳外语教学改革经验，从事外语教学和文化研究等有很大启示意义。

胡教授笃学不倦、注重实践。他一方面博览群书、知识广博，对文学、文化、语言学、翻译等均有涉猎；另一方面结合英语教学，进行文学翻译、教材编写、辞典编撰等学术研究活动，创办了《英语学习》，而且曾担任广播英语教学讲座和电视教学节目主讲，充分体现了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及深厚的人

文素养。尤其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他与英国教师 Kate Flower 一起主持的 BBC 英语教学节目 *Follow Me*，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英语教育发展。

胡教授殚精竭虑，一直致力于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事业。他在繁忙的教学研究、行政工作之余，曾先后主持了“听说法”试点、英语专业大纲制定、英语专业教材编审、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作为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他辛勤工作，不懈努力，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形式使我国的英语教学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在 2005 年 7 月 23 日，正是他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执委会和国际委员会联席会议，成功地争得了 2011 年第 16 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办权，为我国外语教育史增添了绚烂的一笔。

胡教授为人谦和，富有亲和力。我们曾在教育部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共事多年。当时他任指导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兼英语组的组长，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拟定发展规划。他那平易近人、谦谦君子的风范给我和其他同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与胡教授虽然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却相交多年，友情甚笃。岁月流转，不觉我们都已两鬓风霜、早生华发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外语改革发展的期盼却是常青的。

承文仲兄之约，欣然为他的《自选集》作序。但恐自己笔拙口讷，难以充分体现他学识的广博与文采的精妙，所以还是请读者们自己开卷览书，细细领略吧。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 年夏于上海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我于1951年初在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又提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入学，本科学了四年，之后在翻译班和师资班进修两年半。1957年开始教书，直到今年已经执教48年。在做学生时是作为教育对象从旁观察我国的外语教育；做教师以后，无论是教书编教材，从事科研，或是做行政工作，我都直接参与了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也因此与英语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在北外读书

1950年底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我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当时的想法是参加空军或海军，至少也当个坦克兵。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兵种要我，最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了外语学校，分班前举行了一次测试。我记得是在一个大教室里考听写。一位女老师念，我们在下面写，我能听懂的很少，最后被分配在英文系乙级（当时共分甲乙丙三个级）。从此开始了我的英语学习。当时还只有15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正处于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中，外语教育也是一切都以苏联的做法为准。英文系一年级设分析性阅读（Analytical Reading，后改为精读）、家庭阅读、口语、语法等课程。分析性阅读使用的课本是当时英文系秘书程镇球老师从苏联带回来的 *Advanced English* 上下两册。*Advanced English* 与上个世纪60年代英语精读课本类似，由篇幅不长的课文和大量的语音、词汇、语法练习组成。分析性阅读是最主要的课程，每周占十几个课时。课堂上首先由教师讲解和分析课文。讲解透了之后，再做各种围绕课文的练习，包括朗读、背诵、复述、问答等等。课文练熟的过程也就是掌握英语的过程。除了课文工作，在语音、词汇、语法练习上也花不少时间。泛读当时称作家庭阅读，大约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术语。对于家庭阅读虽然重视，但材料十分缺乏，记得能够看到的只有很少的几种，如从苏联引进的 *Vytia Maleyev at School and at Home*, *Three Men in a Boat* 等。在一年级时，

先是李信纯老师教，之后由应曼蓉老师接替。李老师在美国多年，口语非常好，经常在口语课上组织各种模拟的活动，例如，模拟在商店买东西、在家里吃饭等情景，使我们学到实用的英语。当时一个班只有15个学生，上口语课时分成两个组，因此，口语课上只有七八个学生，实践机会很多。小班上课，每班15人，一直是北外的传统做法，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改变。在语法课上做大量的练习，包括时态、介词、冠词等填空练习和造句练习、翻译练习等。二年级精读课老师是刘世沐教授，解放前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博士学位，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回国任教，来到北京外语学校。他英语、法语都很好，又专攻语言史，学识渊博。他常在课上讲各种故事，引人入胜。

除了课堂上的实践活动，课外还展开了多种多样的英语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一般由学生会和班上的学习干事组织。在举行英语周活动时，要求学生只说英语。每人有一张卡片，插在口袋里。谁说了中文，就要在上面划一个记号，最后算分，讲英语最多的在班上得到表扬。有的同学怕说英语就躲着不见人，但是大部分同学还是积极参加。此外，期末常常组织英语晚会，由学生演出各种节目。有的把精读课文 *The Price of Coal* 搬到台上演出。有的自编节目。记得有一次英语晚会上，一个节目是武松打虎，一个同学演武松，另一个同学演老虎，演武松的同学演到挥拳打虎的当口，特别投入，骑在老虎身上，一边一拳一拳地打下去，一边口中大喊：“You beggar, I'll make you suffer.”我们看得十分带劲，热烈鼓掌。后来老师对我们说，演剧主要是练习英语，动作不要占时间太多，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并不是台上越热闹越好。

举办英语晚会从那时起就成了北京外语学院的传统。学生在排练英语节目过程中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把课上学到的英语反复练习直至纯熟。现在在北外英语学院除了举办英语晚会，还增加了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辩论赛等，这些活动在加强学生实践能力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在本科学习阶段，有一项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有益的。我们经常班上组织学习交流方法的交流活动。每个同学先自己总结，然后在班上交流。例如，有的同学特别善于记单词，在会上就把自己记单词的各种方法介绍给大家。有的同学长于口语，就总结出自己练习口语的种种办法。也有的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在会上讲述出来，供其他同学借鉴。当时出于互相帮助的目的才组织这种活动，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现在才知

道，这是学习者自己对于学习策略的总结和探讨，而注重研究学习策略无疑对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自觉性都是十分重要的。

正是由于北外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因此，学生的英语基本功比较好，应用语言的能力比较强。在校的学生经常被调出去做口译或笔译的工作。1953年，正逢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需要大批翻译，我们一部分在学的三年级学生也被调出任翻译。我陪的是一个埃及代表团。当时虽然也感到紧张，但是基本上还能完成口译任务。这种临时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的外语实践能力、增长见识、获得工作经验都有极大的好处。

1954年1月本科毕业以后，学校决定留下一批学生继续进修，培养目标是外交部翻译。我也被留下来，成为进修班的学员，开始领取工资。进修班增加了许多提高语言和翻译能力的课程，例如报刊阅读、口译、笔译、对照阅读等。同时开始英语原著的阅读，这时主要读一些当时被认为思想性强的小说和报告文学读物，例如 *That's Why I Went*, *The Scalpel the Sword*, *Betrayed Spring*, *The Diplomat* 等。在这个阶段教我们的老师主要是张汉熙、程镇球、张振先等教授。

在进修班刚学习几个月，张中载、张永彪和我就被派到团中央，做中国青年代表团的随团翻译，准备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今天，出国已是常事，但在当时，出国工作是件大事，出国前集训一个多月。即使如此，出国时心情仍然十分紧张。1955年7月全团乘火车去华沙，从东到西穿越整个苏联，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全盛时期，每停一站都受到当地青年团组织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华沙我们跟随代表团成员活动，哪里需要翻译就去哪里，主要是做口译。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张永彪和我又留下随同中国京剧团任翻译。但在波兰，翻译主要是靠当地的留学生，我们只是做些零碎工作。访问波兰之后，中国京剧团应邀赴北欧五国访问演出，团长是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当时我们国家尚未培养出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语翻译，所以，派团出访时只能随团带英语翻译，在当地再找英语翻译转译。因此，团长在台上讲话时旁边站着两个翻译，一个是随团翻译，另一个是当地的翻译。除了做口译，还要翻译报刊上的评论，做些笔译工作。在北欧工作的四个多月对于我是一次极好的锻炼，不仅提高了口译笔译的能力，还跟着楚老学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另一个副产品是培养了我对京剧的兴趣。

回国以后，继续在进修班学习。进修班读完以后，本以为可以直接

进入外交部。就在这时，人事处通知潘绍中、张永彪、张泰金、张中载、王鸿斐、王学铭、王瑞和我等共十个学员到办公室开会，会上郝金禄处长说，北外已经是正规的大学，面向全国招生，需要许多教师，因此，要尽快培养师资。学校决定将我们十个人留校，在师资班继续学习一年，然后做教师。我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大部分人不愿意留校，但是，当时的风气是个人服从组织安排，一切服从工作需要，所以没有一个人公开提出不愿意留校。

留校以后，英语系为我们专门开设了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其中有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文学史、许国璋先生的词汇学等。我们还分批到英国专家 David Crook 家里，在他指导下练习口语。这一时期阅读文学原著比较多，包括 Dickens 的 *Oliver Twist* 和 *Great Expectations*, Thackeray 的 *Vanity Fair*, Dreiser 的 *An American Tragedy*, Jack London 的 *Martin Eden* 等。从这个书单可以看出，在选择使用哪些文学作品上教师还是极为慎重的，阅读什么首先要看书的思想内容。

回顾我四年的本科学习和此后两年多的进修，我感到我的英语学习历程反映了北外外语教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北外教学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外语实践能力的掌握和提高，这体现在课程设置、教材教法、教师配备、课内外结合、校内外配合等各个环节。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保证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各部门课程中，精读占据中心地位，从一、二年级一直开设到高年级，在精读课上着重培养学生的口笔语实践能力。其他各门课程也都贯彻实践第一的原则。例如在语法课上，不是抠语法条条，而是做大量的语法练习。北外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口笔语实践能力比较强，适应工作比较快。

以今天的观点反观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英语教学，可能会认为在本科教学中文学和语言学的课程开设太少，人文教育似嫌太弱。但 50 年代毕竟是 50 年代。当时学生入学水平低，有一部分是零起点，需要将主要教学时间用在培养英语实践能力上，因此不可能开设很多的文学和语言学课程。其次，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置于首位，文学教学经常受到批判，文学课的开设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开始教师生涯

1957 年夏，师资班结业。暑假后我被分配在英语系二年级教语法和泛读，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本以为英语学了六年多，教二年级学

生不成问题，但在教学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五花八门。幸亏当时强调集体备课，有老教师从旁指导，回答各种疑难，才把两门课比较顺利地教下来。第二年我被分配教二年级一个班的精读，并做负责教师。这个班入学水平高，成绩好的同学占了很大比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做听写时，有几个基础好的同学连一个拼写、标点错误都没有。英语发音和口语也比较好。教这样的好学生我确实感到诚惶诚恐。这个班我连续教了三年，一直教到四年级。随着教材和学生水平的逐步提高，我不得不尽快提高自己。每天晚上备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词典，翻阅工具书，实在找不到答案时，就求教于组内的老教师。当时教师的工作量比现在要重得多，青年教师每周上课 16 - 18 节，一般都教两三门课，再加上会议繁多，因此，一直到晚上才能备课改作业，通常都要工作到 12 点以后，甚至要到一两点钟，睡眠严重不足。晚上开会就难免打起盹来。为了清醒一点，有时就得拧自己的大腿，颇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味道。

1958 年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中，英语系为了向国庆献礼，决定出版一份普及性的刊物《英语学习》。刊名由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同志书写。编辑部由杨树勋、刘承沛、高厚堃、吴千之和我组成，杨树勋任主编。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划、组稿、编排、送稿、校对直到最后下厂核红签字。工作是业余兼职，不仅编辑工作是无偿的，写稿人也都没有任何报酬。稿子不够时，我们自己常常赶出一两篇稿子补缺。我经常写的是语法和学习方法方面的稿子，因为自己是编辑，所以常用笔名“文朴”，偶尔也用真名。《英语学习》虽然是个小刊物，但却给了我练笔的机会，在写稿的过程中学习写作。此后，我在老教师的指点下开始为《西方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前身）写稿，开始是写些有关教改的文章，之后写了两篇长篇的语法论文，一篇是关于复合宾语，一篇是关于定语从句。为了写这两篇稿子，我翻阅了许多语法著作，收集了大量的例句进行研究，从中发现一些新鲜有趣的现象。这是我科研工作的开端，也是我首次从科研中得到乐趣。记得初次拿到稿费，吓了我一跳，一篇文章的稿费竟然相当于我月工资的一半（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 60 多元）。在当时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这笔稿费对于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在我做学生的时期，外语教学已经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选用什么教材以所谓思想性强不强为准，因此，许多好的材料被排除在教学之外。从 1958 年到 1960 年外语教学政治化的倾向更加严重。为了加强教学内容的思想性，在 1958 年秋季，在二年级的教学中安排阅读 *Peking*

Review。当时学生的词汇量不够大，无法阅读，为此我们组织了词汇突击，让学生在短时间之内掌握成百上千的英语政治词汇。对于学习基础好的学生来说，影响还不那么大，但对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的学生，这种违背教学规律的做法的害处就极为明显。1959年情况有所好转（在这一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但1960年反修开始，教学内容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动。这次突击的是反修政治文件的翻译文本，也就是《九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1961年形势有所松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以后，文学课程有所加强，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选读在高年级正式开设，在教学中所占分量也逐渐加大。

大致上在同一时期，系领导决定让陈琳、张中载和我在刘世沐教授的指导下开设语言理论课程，陈琳教语音学，张中载教词汇学，刘教授和我教语法学。为了钻研语法理论，我把 Curme 的 *Syntax*, Zandvoort 的 *A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Jespersen 的英语语法多卷本统统买来，作为主要的参考书。应该说，当时我在业务上的准备极为不足，为了上一堂课往往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备课。这门课的准备过程是我系统学习英语语法的过程，对语法家的不同系统作对比，对语法的细微之处也注意研究起来。语法看来枯燥，但是一旦钻进去也是乐趣无穷。

1964年北外按照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要求，决定试办三年制，加快培养翻译人材。英语系把邓炎昌、周谟智、夏祖焯和我调出，筹划如何改革教学。在邓老师的提议下，我们开始阅读 Harold Palmer、C. C. Fries、Robert Lado 等有关教学法的书籍，特别着重阅读了 Fries 和 Lado 有关听说教学法的书和文章。这是我们初次接触国外的外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法，使我们大开眼界，也使我们十分激动。我们对于 Fries 和 Lado 的一些基本理论深信不疑，一致认为如果采用听说领先法，可以大大加快学习进度，提高学习效率。我们确定了教学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编出了第一批教材。根据设计方案，在第一个月严格控制文字的出现，让学生完全依靠听吸收语言；通过实物、图片和英语解释教词汇和句型，避免汉语的干扰；通过句型教授语法，练习口语，不讲语法条条；在掌握句型、课文的基础上大量发展泛读。这一教法与北外英语系传统的教法大相径庭，是教学法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对常规教学的一个突破。

听说法教学试验搞得热火朝天。所有参加试验的教师都全力以赴，没日没夜地与学生泡在一起。学生在听说方面的进步令我们激动不已，

有的学生的语速甚至可以达到每分钟一百多词，但我们也很快就发现一些奇特的现象，例如，刚开始试验时，不让学生见文字，学生很不习惯，闹着要书面材料。一个月之后，我们把书面材料发给学生时，大部分学生都对它不感兴趣，将材料放在抽屉里不看。这使我们大惑不解。学生对我们说，只练听说不看书面材料，已经十分适应。对于看书反而不感兴趣。于是，我们迅速采取措施加强学生的阅读。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教学试验。从两届学生的学习效果来看，听说法有着明显的优点，对于发展学生的听与说特别有效。自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有些教学问题的处理上，有些绝对化，缺乏辩证法。当时，国外资料匮乏，得不到听说法教学试验的资料，无法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尽管如此，这一段教学试验的意义却不能低估。有些教学原则亦有着长远的作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听说法的试验，使得这一教学法未能得到全面的试验和总结。

回想“文革”之前这一段工作经历，我觉得我得益最大的是各种实践的锻炼。当时的口号是“在战斗中成长”。口号虽然带有时代的特征，但却包含了一定的哲理。在十年的教学工作岗位上，从教一两门课到教多门课程，从基础阶段教到高年级，从实践课教到语言理论课。通过教学获得了实际经验，提高了口笔语实践能力，初步学会了如何教书。除了教学工作，我还有幸参加了三年制听说法的教学改革，从中又学习了有关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首次参与教材编写。《英语学习》编辑部的工作也给了我许多实际的锻炼，不仅给了我写稿投稿的机会，而且使我学会了杂志编辑工作的整套程序，并养成了仔细校对的习惯。可以说，参加这样丰富的教学和工作实践，确实使我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而这是闭门学习所无法取得的。遗憾的是当时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总结教学，因此，尽管有大量的实践和丰富的材料，却没有作系统的科学研究，写出真正有水平的论文。

我的另一点体会是个人的提高除了自己的努力，还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学术群体。北外英语系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拥有一批人文素养深厚、学术上有造诣又十分敬业的教师。他们对于年轻教师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像是在一所好的音乐学院里，学生整天听到的是水平很高的演奏，心目中的标准自然不同。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刘世沐等教授都是既学识渊博又精于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王佐良先生不仅自己勤于动笔，一生出版专著十余部，还经常鼓励青年教师著

书立说。晚年，他组织了校内外的专家、教师撰写多卷本《英国文学史》，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周珏良先生专攻美国文学，但他对于红学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发表了不少文章。许先生精于语言学研究，是我国公认的语言学家，对于文字极为讲究，在主编1-4册英语课本时，对于课文选择极为苛刻，选定以后，他一改再改，一直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他的四册英语精读课本历数十年而不衰的一个原因。这一学术群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在教师中间确立了一个标准，一个样板，做学问应该怎样做，写文章应该怎样写，教书应该如何教，年轻教师似乎都在张望着他们，看他们如何做，自己就尽量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久而久之，在教师队伍中间就形成了好的风气。

三、校园外的英语教学

1972年，北外开始恢复招生，大部分教师奉调离开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筹备广播英语教学讲座。这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记得教材编写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市教育学院，而教学和播音的任务交给了北外。北外英语系从教师中抽调了四名中青年教师组成教学小组，张冠林、孙静渊是一个播音小组，我和张耘是另一个播音小组，轮流教学。这是从零起点开始的英语教学，基本教学路子与北外一致，只是简单一些。在我国的广播电台教英语，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情。而这件事又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特殊性可想而知。领导一再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四个人自然更加感到忐忑不安。电台的保卫工作十分严格，层层设岗，进入播音室更是严格。上课的内容都是事先录在录音带上，经过审听，证明没有问题之后才送去播放。在当时情况下直播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电台上教英语和在课堂上教英语是完全不同的经历。首先，在你面前没有学生，而你要设想学生就在你的面前，语气要和面前有学生完全一样，要同样亲切自然。另外，在发音上也有不同，例如，如果在词尾出现鼻辅音，就要稍为用力一些，夸大一些，否则在收音机里就听不到这个鼻辅音。北京电台开始英语讲座以后，反响十分热烈，听众纷纷来信，提出各种问题，我们从中挑出一些解答。播讲一段时间以后，电台还组织我们与听众座谈。听众特别喜欢我们播放的配音小故事，例如